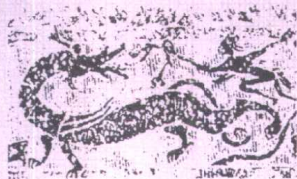


● 施正康 陈达凯 著

YANXU YU SHANDAI

衍续与嬗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漫论



 文匯出版社 ZHONGGUO CHUANTONG JIAZHIGUAN

衍续与嬗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漫论

施正康 陈达凯 著



文匯出版社

衍续与嬗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漫论

著 者/施正康 陈达凯

特约编辑/王 怡

装帧设计/范桥青

责任校对/邱 红

出 版/文匯出版社

(200041) 中国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文匯出版社

制 版/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9.3 千字

印 张/10

书 号/ISBN7-80531-754-2/G·423

定 价/17.00 元

目 录

引 言 虚 与 实

聒噪千年的义利之争	8
“义生利”和“德生功”	15
俗不可耐的铜臭	20
名利论一：隐士效应	25
名利论二：忘名、立名和窃名	30
聚财和散财	36
崇俭和抑奢	42
不患寡而患不均	49
“杀尽不平方太平”	54

公 与 私

中国的家和家族	64
荣损与共的家族关系网	69
“孝”的重担	76

	移孝为忠	82
	忠孝观念下的人格依附	88
	忧国忧民之心和儿女私情	93
	乡谊、人情和面子	98
	官本位	104
	读书做官,公车路窄	110
	公则胡越一家	116
治 与 乱		
	农业社会的特征	128
	人心思定,安土重迁	133
	知足者常乐	139
	崇古尊老	146
	治世与乱世	154
	重德轻才	160
	谦厚之风	165
	统一和分裂	172
	循旧和变革	178
	中庸之道的魅力	185
生 与 死		
	寻求永恒的价值	194
	天人合一	201
	摆脱欲望的困扰	207
	治生与治学	214
	黯淡的理性之光	220
	奇妙的心理平衡	228

	意气、门户和党争·····	236
	气节和生死观·····	244
迂腐与超脱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254
	离经叛道者的轨迹·····	262
	圣人何在?·····	267
	帝王思想的价值追求·····	273
	大众价值观导向·····	279
	价值荒与价值系统的重建·····	285
	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影响·····	292
	动荡中的稳定·····	298
尾 语		

引 言

很久以前,我们就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研究产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也非常需要认真思索的课题。但是,在多次涌起的“文化热”、“经济热”中,它或是被忽略,或是被淡化,很少有踏踏实实成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这一研究本身的难度——史海茫茫,前辈的研究成果大多聚集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对于隐埋于其结构深层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不以特定的视角去重新梳理历史,大概无法全面把握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内涵,至于分析、批判和继承,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价值判断。价值观念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有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风俗、习惯、舆论、法令,甚至家规、乡约都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维护

和强化这些观念。共同的价值观念是维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价值观念的过于划一和僵化不变,则会变成思想精神的枷锁。千百年来,过于划一的价值观念恰如一串强人就范的先验逻辑锁链,将中国人禁锢在难以逾越的雷池之中。于是,咱们的老百姓大多变成不争不怒的顺民;出类拔萃、暴富冒尖者成为众矢之的;矫情伪饰、弄虚作假蔓延成社会的通病;知识精英们既为强烈的“经国济民”使命感所驱动和折磨,又不得不在脱离现实的道德章句中寻求精神寄托,耗磨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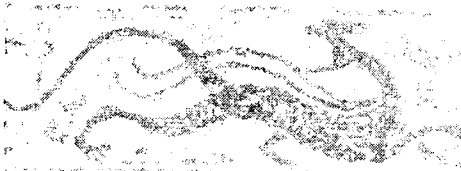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又使我们的祖先在强盛时故步自封、裹足不前,毫无顾惜地宣泄自己的余能;在衰弱时死抱古训,追忆陈迹,依然夜郎自大,不思改过。整个社会平稳而无生气,和睦而无力量,僵化而仍具弹性,虽然屡经大的动荡和大的破坏,各方面的变化却微乎其微。在千百年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却如时针的走动,完成了“零”的路程。

面临新世纪的中国正以亘古未有的崭新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衍续?几千年的价值观念积淀如何在新旧制度交替中嬗代?这无疑是一个有历史重负的民族在继续前进,持续发展必须直面正视并认真思考的问题。本书将从虚与实、公与私、治与乱、生与死这四对中国人生活中历来占重要地位的价值范畴入手,探讨它们的根源、沿革、表现、后果及影响,以期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这些命题作出

回答。

价值观念的研究虽然是一个新的领域,而我们仍然采用了非常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本书多方采撷史料,不烦引经据典。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统的题目用传统的方法研究更为和谐,另一方面是希望将这个题目做得严谨踏实,使我们的论证更贴肉切骨。因为做这种题目是很容易滑进空泛虚张的浆糊洞里的——而尊重史实,重视原始资料,正是避免“失足”的警戒。

就本意而言,我们引证资料力求做到认真筛选,它们容易读懂或稍做解释引导便能读懂,其中一些还是较少为人注意的很有意思的史料,读这些史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享受。在此基础之上,希望我们的阐述、分析和评论,能够起到帮助读者沿着这些史实铺筑的隧道,去理解那古代文明深层的精神基础的路标作用。



X
U
Y
U
S
H
I

虚与实

在中国创世纪神话传说中,天地本来混沌如一枚鸡子,后来被盘古刀凿斧劈,一分为二,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天虚是阳,地实是阴。华夏文明虽然扎扎实实诞生在这看得见摸得着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的祖先对虚幻无际的苍天却怀有更大的敬意。天命、天意、天性、天道、天理……这些概念除了各自的特殊性涵义略有差别之外,其共同涵义则都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根据和普遍法则。由是,“天”成为精神世界的代表。人心向善,体现了天的阳,也就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情趋贪,体现了阴,也就是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讲仁讲义,自然都是务虚;对物质世界的追求,讲富讲利,捞的便是实惠。将虚与实放在中国人的价值天平两端,向上翘起的该是哪一头?

聒噪千年的义利之争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罕言利”，因为，“见小利，**两**则大事不成；”^①又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由于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儒学后人便对义利之辨十分用心。孟子步其后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义利问题上走了个极端。梁惠王高高兴兴地迎接他，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却对这种满腔希望兜头一盆冷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③汉代董仲舒给江都王编了个故事，说鲁国国君问柳下惠能不能出兵伐齐，柳下惠回去后面有忧色。但他倒不是为国君想打仗而发愁，却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原来伤心是为了人家没有将他视为仁人，而只是问他打仗争利的事，真是太委屈人了！董仲舒对此却大加赞赏，并由此阐发自己的观点：“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儒家正统的义利观念由是建树起来。儒家对“义利之辨”的关注，朱熹的“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可以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

① 《论语·子路》。

② 《论语·里仁》。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汉书·董仲舒传》。

和儒家“贵义贱利”的道义论最对立的是法家“唯利无义”的行为功利主义了。商鞅、韩非从不讳言利。韩非认为,求利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原始动力,“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轂者也”。^① 只有公开它,认识它,利用它,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是因为“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② 造车人希望别人富贵,制棺材者希望别人短寿,并不是前者心好,后者心恶,而是“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材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③ 君臣之间也是一种犹如买卖的利害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④ “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⑤ 多么犀利的目光和何等深刻的分析!在这里,只有功利的目的是至高的,一切道德规则的约束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时间、地点、条件都可以变化,但行动准则只能是唯“利”。秦始皇从中大受教益,施诸实践,很快吞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王朝。赤裸裸地讲利,虽然功效显著,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利益者的矛盾也日渐公开和激化。对此,法家的武器只有刑杀,结果如火上浇油,焚毁了帝国,也宣告了法家的义利观的失败。

“义利并重”的墨家义利观介于儒、法义利观之间,这种义利观带有显明的规则功利主义的特征。墨家也尚利:“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

① 《韩非子·问辩》。

② 《韩非子·六反》。

③ 《韩非子·备内》。

④ 《韩非子·难一》。

⑤ 《韩非子·奸劫弑臣》。

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惠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① 因此，要旨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② 但是又不是见利忘义，尚利的同时也应该重义，因为“万事莫贵于义”；^③ “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须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劲则不疑，运途咸得其所，而顺天鬼百姓之利。”^④ 所以，在后期墨家那里，这两个看来似乎势同水火的范畴被统一得毫不含糊：“义，利也。”^⑤ 在这种义利观看来，功利的目的是重要的，但它的实现却必须顺义，必须遵循道德规则的约束；考虑利和义，虽有前后之序，却无轻重之畸，以至还会有“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愁、去爱、去恶，而用仁义”^⑥ 这种以义抑利（情欲）的态度。

先秦的各种义利观虽然如针尖麦芒，针锋相对，但各言各说，自立门户，倒也相安无事。真正当面交锋的义利之争始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 81 年）的盐铁会议。从各郡国赶来的儒生代表——贤良文学们坚持孔孟重义轻利的传统，他们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

① 《墨子·天志下》。

② 《墨子·非乐上》。

③、⑥ 《墨子·贵义》。

④ 《墨子·非攻下》。

⑤ 《墨经·上》。

欲实菽粟货财。”^①言者皆请罢盐、铁、酒酤、均输官。与之辩难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公开鄙视儒家的仁义之说，他说：“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他认为应该像商鞅那样“举而有利，动而有功”，一举一动都以功利为目标，才能真正对国家人民有益，使自己“功如丘山，各传后世”。^②对于那些耻言财利高唱仁义的儒生，他的讥笑不能说不尖刻：“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谤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③然而汉代毕竟不像秦代，汉武帝尚且是“内多欲而外仁义”，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同受顾命的桑弘羊也不敢毫无顾忌地打出重利的旗帜，在辩论中，他就一再宣称自己施行的政策“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非有司欲成利”。^④

汉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也日益稳固。到宋代，“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⑤用义利来评判人的活动成为普遍通行的原则。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⑥把世界上的事情这样绝对地划分成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对立的两种，看起来好像出自大程先生这种“书笃头”的书生意气，

① 《盐铁论·本议》。

② 《盐铁论·非鞅》。

③ 《盐铁论·地广》。

④ 《盐铁论·本议》；《盐铁论·利议》。

⑤ 《直讲李先生文集·富国策》。

⑥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